

高等教育研究简报

2026 年第 6 期

主办：保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2026 年 8 月 27 日

本期主要内容：

本期聚焦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核心主题，系统阐释质量文化内涵、形成机制与建设意义。质量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高校回应社会关切、彰显育人功能的关键支撑。质量文化建设，需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健全校院两级组织架构，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持续改进、彰显办学特色等。质量文化建设要从制度、组织、标准等层面给出可落地的实施路径，引导高校由制度约束迈向文化自觉，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质量根基。

目 录

1.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	1
2. 面向教育强国的高校质量文化建设	28
3. 超越技术主义——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多重审视	44
4. 中国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指南（试行）	63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

别敦荣，易梦春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所形成的理念、信念、价值及由此所衍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关制度、行为、惯习、物化载体等的有机体。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高校是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主体，师生是质量文化的直接创造者，质量评估和认证是质量文化创新发展的推进器。质量文化建设是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是高教界面对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是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显示屏”。加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质量价值，打造基于高校的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构建内外结合、合作共治的质量保障体系 and 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关键词：质量文化；高等教育；评估；认证

质量文化是近年来高教界出现的一个热词。质量文化及其建设是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过程中，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审核评估和有关认证工作中，从上到下充满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切。尽管质量文化为高教界领导所重视，高校干部教师在各种报告和文件中经常读到，也经常谈到，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却还不够清晰和深入，在质量文化建设上也难说举措适当、应对自如。实际上，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本身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存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更增添了领会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精神实质、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难度。新近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办法（2021——2026 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单列为审核

要素，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开始迈进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完善制度延伸到建构文化，从注重“制度约束”过渡到强调“文化自觉”。尽管这种转变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趋向，但它也给高教界带来更艰巨的任务，需要人们更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理解质量文化的性质，明确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

质量文化为人所重视只是最近的事情。毫无疑问，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由来已久，在保证和提高质量方面采取了诸多政策和措施，有的质量理念和相关政策措施在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坚持了下来，成为传统和习惯，但质量文化并没有引发人们的关注。在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人们开始从文化角度认识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质量文化概念并受到重视，成为相关政策的重要主题。但客观上讲，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还有待厘清。

1.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能脱离高等教育文化。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现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也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所形成的理念、信念、价值及由此所衍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关制度、行为、惯习和物化载体的有机体。它既有广狭义之分，又有宏微观之别，还有精神与物质的不同表现方式。

（1）广义和狭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文化总是附着于一定的社会现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附着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有广狭义之分，质量文化也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高等教育是指师生所建构的教与学活动及其过程，师与生、教与学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他要素都为实现师生教与学目标服务。因此，狭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师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所奉行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活动中所沉淀和积累下来的规则与惯习的总和。也就是说，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可或缺的主体，质量文化扎根于师生内心，表现于教学活动，分布于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学质量，是最深层的高等教育质量决定因素。

广义的高等教育是指社会或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往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政府施政治国的重要领域。因此，广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国家高等教育部门所存在的质量文化，既包括狭义的质量文化，又包括政府和社会参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秉持的价值追求和积淀下来的稳定的作用方式。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师生，又包括高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等；高等教育质量价值是多元的，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体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强势主体的作用对质量文化生成和变化具有主导作用。

（2）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高等教育是特定组织机构的职能。一所高校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往往被看作是微观的，而多所高校或一定地域范

围内所有高校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则被认为是宏观的。因此，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要是指一所高校所形成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质量生成和保障制度、活动规范要求等。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它所遵循和实施的高等教育政策、所追求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直接影响各学科专业的高等教育活动，影响师生的教学过程。时间一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便形成了。这就是说，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高校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与高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它不仅与高等教育质量生成不可分割，更是质量保障的基石。

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由微观的质量文化所构成，微观的质量文化是宏观质量文化的基因。正如个性与共性的差别一样，个性的质量文化属于具体的高校，共性的质量文化则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高校所共有的质量价值追求以及相关规则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一定区域高校共同遵循的质量价值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规范和工作要求。这里的区域可以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行政区划的。地理上的往往与一定地方的文化相关，比如，东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北地区的文化对当地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有重要影响；行政上的往往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相关联，比如，上海市对全市高校的高等教育发展有自己的规划，对全市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与其他省市自治区存在差异。当然，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对全国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不

仅有标准，而且有持续的评估督导，这对于全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精神和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比如，理念或价值观，但也有物化的表现形式，比如，建筑文化，即建筑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价值取向，一如宫廷建筑所代表的庄严、恢弘和大气，寺庙建筑所表现的虔敬、肃穆和寂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也是如此。就精神而言，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高等教育质量观所包含的价值取向。质量上的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体意志的体现，不同主体的组织性质不同，高校、政府、社会其他组织和民众之间的差异很大，他们在高等教育质量上的诉求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也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内容。不同主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政府主要通过相关政策的高等教育价值指引来体现，高校通过自身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改革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价值选择来反映，社会其他组织或通过舆论或通过对外校毕业生的要求来表达高等教育价值评判，民众则主要通过求学意愿来实现自身的高等教育价值要求。在以知识为目的的质量价值取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是围绕知识授受所发展起来的一套办学规范和行为活动要求；在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质量价值取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包含了更多的与社会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学的制度和教学活动要求与惯习。

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精神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可分割，没有精神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不可能有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存在。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

要指高等教育活动中所利用和产生的体现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及其实现状况的物化存在。一方面,这种质量文化存在于高等教育过程中,服务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表现为教育教学环境条件。比如,教室和教学设施都是开展高等教育活动所必需,它们不是普通的物质条件,而是包含了高等教育价值追求的物质条件,智慧教室与传统教室所包含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不同,多媒体教学设施与传统的电化教学设施所追求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存在差别。毫无疑问,这些建筑、设施条件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它们承载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评价与选择,又被用于实现人们的高等教育价值追求。再如,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高楼大厦和庭院环境所承载的文化理念殊异,高校的选择往往包含了对质量的倾向。另一方面,物质的质量文化还可以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所开展的活动及其结果的物化形式,比如,培养方案、课表、课件、讲义、实验报告、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决议书等。这些记载教学过程中师生教学行为与成果的实物有的体现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的追求,有的反映了价值追求的结果。

(4) 持续改进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维新的,它的目标指向是更高的质量、更强大的高等教育。持续改进既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在品质,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机制。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保持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且不断走向壮大,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向普及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

高等教育拥有质量文化所蕴含的持续改进的强大动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质量价值诉求相结合，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现实需要，促成了各种内外部质量评估、督导和认证工作的开展。不同主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博弈是持续改革的动力源泉。

2.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同时产生，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变化而不断演进。不论人们发现与否、承认与否，它都在那儿，历史的印记层层叠加形成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时代特征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展现出现实的适应性。

（1）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

质量文化产生于高等教育活动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因为只要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过程是连续的，那么，质量文化就是连续积累起来的，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为质量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使质量文化出现累积效应。即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断裂，质量文化也会“记录”断裂的痕迹。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不论高等教育历史有多久远，质量文化积累有多深厚，它既要影响现实高等教育及其质量生成，又要将现实高等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质量价值与规范沉淀并加以吸纳，使自身的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高等教育发展常常不是直线性的，发展历程可能出现曲折回流，质量文化也会随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而打上相

应的烙印，还会表现出层次感，将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观与相关惯习展露无遗。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经验，有的高等教育理念和体制机制可能被移植到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这样的情境中，质量文化也会发生迁移或飘移，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发挥作用。

（2）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主体。

尽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但所有的质量文化都只有在高校扎根，才能影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很多，高校才是形成和发展质量文化的关键，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努力必须通过高校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比如，从世界众多国家的实践来看，不论采取何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有的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有的采取间接干预的方式。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都需要经过高校的转化，才能真正影响高等教育，政府所倡导的质量价值和要求才能指导高等教育活动，从而融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温床。高校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建制，高等教育所赖以发挥功能的学科专业是由高校创建的，教师是由高校聘任的，学生是由高校招收的，所有人才培养活动都是由高校组织或牵头组织开展的。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以高校为组织单元发展起来的，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都需要

经过高校筛选才能内化到学校组织文化中去，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并非只有高校一个原生源流而是具有多源性。

（3）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直接创造者。

高等教育质量的本意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上。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不仅成就了学生的发展，而且他们的活动印记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源泉。在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中，查阅教学档案是人们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比如，教学大纲、实验手册、学生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等档案资料是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历史文献，查阅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人才培养过程情况，窥探高等教育质量特点。不论是高等教育教学活动还是教育教学档案资料，都是高校师生的杰作，是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作出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是师生创造了高等教育文化，其他主体可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质量文化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但他们在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不可与师生相提并论。

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春风拂面、润物无声式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师生的每一次教学活动、每一次交流互动都具有文化意义，师生的行为不但是在发现教育的意义，而且是在塑造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师生所践行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观可以源自他们自我的发现和领悟，也可以源自高校的办学要求、政府的政策精神、社会其他组织的期望和

公共舆论的呼吁。这些高等教育价值观只有为师生所认同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贯彻落实，才可能沉淀而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相关的自然人群体很多，比如，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社会民众尤其是家长、企事业单位有关领导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都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所有相关的自然人群体中，只有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造的亲历者。

（4）质量评估和认证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新发展的推进器。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具有发展性，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高校运行中，质量文化进行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积淀是质量文化形成的基本机制，看似平淡无奇的高等教育日常活动，日积月累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留下印迹，在高校相关规章制度和环境条件上打上烙印。

高校办学受到校内外诸多组织机构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受到多方的关注。政府在其中具有重大影响，它的身份及其所拥有的高等教育管理和治理权力，使其对高等教育质量不能不高度重视，并采取权威性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和规范高校办学，以达到其所希望的办学目的。正如格里纳（F. M. Gryna）所说，文化不属于技术范畴，但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这种质量文化。20 世纪后期以来，我国政府探索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推动了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高职高专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制度的建立。联合相关行业部

门建立专业认证与评估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丰富了质量文化的内涵。质量评估和认证理念已经为高校所接受和认同，以评促建、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价值观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意义

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土壤。优良的质量文化能够孕育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相反”低劣的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质量文化的形成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自然天成，二是有意作为。前者是指师生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质量文化，后者主要指在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下，师生受各种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改变教育教学行为，从而导致新的质量文化的生成。这是一种主动作为、有意建设的质量文化发展方式。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质量文化建设成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大规模发展的重点战略，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概而言之，质量文化建设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是本体意义，一则是社会意义。二者是统一的，分而析之只是为了更深入清晰地认识质量文化建设的意义。

1.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本体意义

质量文化建设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施、为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发展服务的活动。质量文化不可能脱离高等教育而存在，质量文化建设工作也只能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施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达到建设目的。所以，质量文化建

设的要义在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本体意义。

（1）质量文化建设是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精英化阶段少有质量文化建设，高等教育发展超越精英化阶段后，质量文化建设愈益受到重视。规模扩大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第一特征，规模扩大必然带来生源的多样化以及求学意愿与目的的差异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不但会造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变化，而且质量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转化将支持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只有 70 余年，而精英化高等教育虽然只占适龄人口的 15%，且在精英化阶段适龄人口的数量比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要少得多，但它的发展历史却要长很多。如果说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比较多地表现为自然天成的话，那么，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各方越来越利益攸关，所以，质量文化建设成为高校、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任务，它也是实现各利益攸关方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的重要路径。

高校和社会各方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主要是为了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多样化，这既是受教育者社会背景和求学意愿的反映，也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不可能自动获得，它离不开高校和社会各方的积极行动，也就是质量文化建设。20 世纪后半期众多国家和地区创建高职

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但使高职教育文化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成为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并走向普及化的可靠保证。纵观世界，尚未发现哪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过程中没有开展质量文化建设的。比如，美国建立了多元化的认证制度，使质量认证文化嵌入了高等教育，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中质量底线的保证奠定了基础。英国改组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并不断完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制度，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政府财政拨款相关联，不断提升了高校办学的质量意识，而且使教学评估、研究评估、质量审核等成为保证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

（2）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大抓手。

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关键组织主体。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就会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质量文化建设可以塑造高校的办学特色。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高校类型和特色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众多需求的刺激下，高校很可能觉着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能忽视或放弃，从而迷失自我，徘徊于各种需求之间，摇摆于各种办学定位之间，不能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质量文化建设有助于高校增强办学定力，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持续不断地累积组织文化，厚植文化传统。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后，几乎所有高校都会面临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办学需要的问题。高校即便确立了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但要做到咬

定青山不放松，培育鲜明的办学特色，并不容易。质量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保证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还能不断强化高校组织文化，使学校文化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规范教职员工的办学观念，调节他们的办学行为“聚合人心”使学校办学方向不发生偏移或错位。比如，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转型发展后，尽管办学规模扩大了，学科专业门类和数量增加了，生源的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学校功能也拓宽了，但并没有改变自身基本的办学方向，而是保持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份办学定力，与质量文化建设不无关系。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 Summers）曾说道：“保持哈佛的强大，需要精心地维护和强化致使我们长盛不衰的法宝：保持开放与质疑、探索与服务、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以通识教育传统为例，哈佛大学通过持续不断的质量文化建设，强化通识教育传统，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1945年时任校长科南特（J. B. Conant）指派一个委员会对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形成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加强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以培养有责任的良好社会公民。1978年时任校长博克（D. C. Bok）组织专门委员会围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进行调查研究，发布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决定实施核心课程计划（core curriculum）。为了适应21世纪的需要，哈佛大学决定用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取代实施了近30年的核心课程计划，2007年《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提出了新的课程设计，将1978年实施的涵盖7个领域的“核心课程”重组为8个，包括审美和诠释、文化和信仰、

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和世界中的美国。

（3）质量文化建设有利于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

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是高校办学的内动力。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其损失和影响远远大于经济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经济生产质量问题尚可弥补，高等教育只要出现质量问题，就具有不可逆性，贻误个人前途，影响家庭和社会。所以，高校举办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是与生俱来的使命。

质量文化建设是维新的。质量文化建设，不论是来自政府的要求，还是来自社会舆论或工商界的要求，抑或是高校自身所动议开展的，都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国政府持续开展的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是一场重要的质量建设运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进程中，既发挥了保证底线质量的作用，又发挥了提高质量的作用。新一轮审核评估所设计的分类评估体系将为高校教育教学植入新的质量文化基因引导高等教育在分类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提高质量。

高质量高等教育可能通过高校按部就班的教育教学实践来实现，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且不确定性很大。质量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进取性的高等教育发展行动，它所追求的就是在较短时间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质量文化建设往往是目的明确、行动有力的高等教育活动或治理活动，它不仅要求在短期内取得实际成效，而且要

求将新的文化基因加以有机融合，创新高等教育文化，从而奠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牢固基础。

2.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高校，影响却不只在高等教育内部，还会辐射到社会各个方面。民众所需要的不是劣质的高等教育，社会企事业单位也不欢迎低劣的高等教育“产品”，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

（1）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面对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与精英化阶段相比，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各界关注。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加快，规模增长几乎直线上升。据统计，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到2019年，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914.90万人，增长744.3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76%增长到51.60%，增幅达到41.84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幅度不仅对高教界产生了重大冲击，令人们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产生怀疑，而且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信任危机，主要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疑虑加重，对高等教育发展持消极态度。高教界既需要自省，以强大的定力和创新的精神维护高等教育发展局面，营造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态势，又需要自强，以积极的状态和正面的形象回应社会各界关切，呵护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主动作为、回应社会关切的有效手段。只有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要求，创新发展质量文化，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质量奠基，才能化解社会

各界的质疑，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教界一方面加强了对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提出了多元质量观、应用型高等教育理念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加强了高职院校建设和应用型高校建设，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引入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这些建设工作的推进，既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向多元化转型，又在文化意义上创新了高等教育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社会关切倒逼高教界开展了质量文化建设。

（2）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校满足人民群众高等教育需求的责任担当。

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不只是为了让民众有学上，还要让民众上好学，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高校发展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高校办学和发展的任务是不同的。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740 所，比 1998 年净增 1718 所，增长 168.10%。这就是说，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历史不到 20 年，新建高校占多数，积累少，质量文化薄弱。另外，统计表明，1998 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为 340.87 万人，到 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3031.53 万人，2019 年比 1998 年增加 2690.66 万人，增长 789.35%。满足新增数以千万计民众的高质量教育需求，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质量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受益者主要是学生。学生受教育质量不能保证，质量文化

建设就是玩虚招、瞎折腾，浪费人力物力，难言高等教育有质量。针对新建高校多、扩招数量大的实际情况，从保证底线质量的要求出发，我国组织开展了新建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高职高专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重点解决两类高校的基本办学条件缺口问题和教育教学工作秩序混乱问题。近 20 年来，新建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以评建为抓手，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加强了师资队伍，基本配齐补足了办学条件，改善了办学环境，健全了教育教学制度，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

评建文化已经在高校初步扎根，评估认证已经成为高校谋求更好发展、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评建文化的形成是高校办学走向正规化、办学质量得到社会认可不可缺少的条件。

(3) 质量文化建设是展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显示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母机”，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不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所培养的人这个中介来完成的。不仅如此，其社会功能不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具有长期性和发散性。所谓长期性，是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作用，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逐步体现出来。有的大学排行榜将毕业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等科技成就奖者作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或贡献的主要指标，其实，从毕业到获奖常常需要数十年时间。在这数十年中，有太多的因

素可能影响毕业生的社会成就，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发散性，是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很多方面。很多调查表明，毕业生在不同行业部门职业岗位流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所从事的很多岗位或职业与他们所学习的专业往往关系不大，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关系。所以，考察或评判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并非易事。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展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显示屏”。质量文化建设项目实施的影响不只在高教界内部，它同时也会延伸到外部，向社会宣示高教界追求高等教育质量的决心和行动。近年来，我国高教界试点实施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师范类专业认证和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认证要求相关专业教育贯彻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把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教学相关联，对相关专业教育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评价，以推动各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这些认证工作的开展既使高校相关专业办学目标更加明确，教育教学工作更加规范可查，人才培养质量更有保障，同时也使社会有关方面更理解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与要求，更清晰地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情况，尤其是社会有关行业部门专业人员参与认证工作，更是将社会生产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带入了高等教育，促进了高教界与社会有关方面的有机互动。以往人们常常把高等教育质量看作一只黑箱，比喻无法透视质量的生成过程，有了质量文化建设，社会有关方面就可以从高校人才培养过程考察高等教育是否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策略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它以形成新的质量文化，淘汰过时的质量文化为直接目标，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不单是高校的责任，政府、社会有关方面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质量文化建设的内容丰富而多样，各高校校情不同，教育教学的具体使命和任务各异，质量文化建设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存在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向普及化的中高级阶段推进，高校必须担负起保证质量的使命，展现责任担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建设和发展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关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出推进和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要求，既体现了政府对质量文化建设的关注和重视，又表现出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核心价值

任何质量文化都包含理念、信念和价值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正是这些决定了质量文化的性质和表现方式。传统上，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理念、信念和价值主要是关于知识和教师无可替代、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知识中心和教师中心是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尽管在观念上和政策文件中学生中心已司空见惯，很多教师把学生中心作为谈论教育教学改革的口头禅，但在实际工作中，学生中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没有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价值。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还是传统的，质量文化建设必须解决核心

价值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基本性质。

学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又是目的所在。一切高等教育质量及质量文化最终都要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学生中心是现代高等教育价值与传统高等教育价值的分水岭，遵循学生中心原则，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必须从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出发，落实学生主体地位，构建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发展质量。从根本上讲，质量文化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让学生爱学习、会学习、要学习上，如果不能解决学生学习认知和信念、学习方法和行为以及学习成效问题，质量文化建设是无效的。

落实学生中心原则，需要质量建设主体多方面协同行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等教育政策、行动都要以学生为中心，落实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将学生中心原则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使服务学生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统一起来，以凸显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核心地位。高校必须践行学生中心理念，办学定位与发展愿景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课程教学改革、社会合作与国际交流、教学环境条件更新等都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发展质量为准绳，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应当把学生作为出发点，在评估和认证原则与标准中牢固确立学生中心原则，所有关于高校教育教学的评估和认证都应把考查学生中心地位和学生发展质量放在首位，使学生中心

价值理念在评估和认证中沉淀下来，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价值。

2. 打造基于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

质量文化建设是有组织的行为。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多元的，有高校、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主体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关注质量的侧重点不同，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是存在差别的。高校是质量建设的直接主体，也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质量文化建设的承接者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质量文化建设需要通过高校的接受和消化，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新内涵。由于各主体间复杂的行政和治理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主体的单打独斗行为，而是相互合作、共同用力的行动。所以，开展质量文化建设，必须健全合理有效的组织体系，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主体能够有机关联起来，有条不紊地行动，使各方的努力形成合力，最终达到丰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内涵，创新质量文化形式的目标，从而切实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它可以自己组织开展质量文化建设，这是它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的本分，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转型阶段的“必修课”。只有通过质量文化建设，高校才能逐步消解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新质量文化内涵，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政府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又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者和引导者，政府对质量和质量文化的重视常常会转化为高等教育政策和改革行动，质量文化建设

常常体现在各种相关政策导向和改革举措的实施上。其他社会组织既可以独立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也可以联合高校或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相关质量建设行动。尽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上的作用是重要而显著的，但他们的作用必须通过高校才能发挥实质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还扮演着质量文化建设的中介者角色。尽管不同组织进行质量文化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同，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和攸关的利益存在差别，它们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所秉承的价值原则是不同的。建立相互关联、导向积极、以高校为基础的质量建设组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组织体系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其目的在于强化质量攸关的共同精神信念，构建不断提升的质量文化共同体，形成共同参与的质量建设合力。高校是这一组织体系的基础，这是由高校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在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中，高校既扮演着直接的建设者角色，又扮演着承接并转化其他主体质量文化建设影响的中介者角色，还扮演着与其他主体共同建设质量文化的合作者角色。这不仅需要高校的自觉，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承认和尊重高校的角色。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发挥积极的建设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作用，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提供政策动议、法律规范、行政指导和经费支持。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组织，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具有领导高校的职能，所以，政府对高校的质量文化建设具有领导之责。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也可以发挥建设者的作用。作为建设者，其

他社会组织应当与高校加强协同合作,将社会行业产业部门和公众的质量意愿带入质量文化建设中,丰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价值,增强质量文化的社会适应性。组织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在于制度,高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要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角度推进质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将质量保障落实到制度上。

3. 构建内外结合、合作共治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保障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它包含一系列行动,比如,评估、认证、状态数据监控、审核(或审计)、绩效考核、发布质量报告和排行榜等。这些行动可以由高校发动和组织开展,也可以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推动和组织开展,还可以由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大体而言,这些质量保障活动可以划分为内部质量保障和外部质量保障,内部质量保障是由高校组织开展的,外部质量保障是由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不论是内部质量保障还是外部质量保障,它们的目标指向都是一致的,即改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内部质量保障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基石。高校开展内部质量保障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只要高校开展高等教育活动,就离不开质量保障。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高校办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并不紧密,高校的自主性很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是高校的事情。高校组织开展的质量保障主要是通过背诵、演讲、辩论、问答等考试考查活动实现的,外部组织甚少干预或参与。尽管在精英化后期,有些国家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审核、统考测验

等质量保障活动，但内部质量保障还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方式。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尽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但高校的内部质量保障仍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高校的中介者角色更强化了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作用。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应当更好地发挥内部质量保障的作用，高校应当牢固树立质量文化意识，高度重视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将质量保障的根基植于学科专业教育教学过程，将学生本位、持续改进和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融入办学各方面和全过程。

外部质量保障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质量建设与关切活动。应当承认，外部质量保障与高校的质量追求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但这并不说明可以忽视或无视外部质量保障。实际上，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高，外部质量保障发挥的作用就越重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发挥外部质量保障的作用，建立内外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作用机制，以达到在保证底线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高校应当主动接受和吸纳外部质量保障理念，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质量文化价值，吸收外部质量文化价值，形成与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需求相适应的质量文化。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拥有广泛的社会治理权，它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的所有行动都是直接针对高校的，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直接性和权威性。因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在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从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组织开展多样化的质量

保障活动，利用政策法规和资源配置杠杆，引导高校增强质量意识，校正办学定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其他社会组织的质量保障活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与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和质量审核与认证，将自身的质量诉求反映到高校办学中去，并通过一定的质量控制机制影响高等教育质量，这种质量保障就是直接的。它们还可以完全自主地开展各种研究、认证、排名活动，面向社会发布质量研究报告、认证结论或排行榜，供社会各界和民众参考，高校也可以借鉴这些活动的结果，在自身办学过程中加以运用，这样的质量保障就是间接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他社会组织都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出发，开展各种质量保障活动，对高等教育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建构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质量文化建设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在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基础上进行的旨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努力基础不好不牢，质量文化建设只能是亡羊补牢，作用有限。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在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基础好了，就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争取更好的建设成效。

高等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长时期的沉淀和积累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办学的必要条件。只要经费条件有保证，科研人员水平高，科研工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但高等教育却是一个“慢工活”，积累不足就会基础不牢，质量难有保障。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历史不长，加之办学

之初因陋就简,缺乏周密系统的规划设计,投入和资源保障有限,高等教育文化积累不足。因此,在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重视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双管齐下,开创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规模与质量统一、形式与内涵兼备,发展大规模、高质量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

应当进一步调整和拓展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开拓新的布局,实施与大众化和普及化深度推进相适应的区域重点支持政策,扩大高等教育容量,为更多民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开辟新的空间。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为非传统生源工学兼顾进入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提升技术支持能力,发展线上高等教育,支持虚拟大学办学,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学体系。进一步加强学情研究,以学习者为中心,改革教育教学模式,优化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切性,发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办学资源筹措能力,改革资源配置政策与方法,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社会资本和私人投入相结合的资源保障机制,全面改善高等教育办学条件,以优越的办学条件和环境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展高等教育文化培育,以新理念新思想指导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以高校学科文化建设和组织文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文化培育,打造与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文化,为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3月

面向教育强国的高校质量文化建设

陈正权，李 恋

摘 要：质量文化对引导高校办学质量的理性回归与价值重构、夯实教育强国建设“六力”的指标征候具有促进作用。其内在的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决定了质量文化建设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重塑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更是化解质量危机的关键抓手。然而，质量文化建设面临着多种挑战，如目标混乱、责任规避、制度缺失、评价异化、表征趋同等问题制约其内生引领和内聚共生。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需要构建“使命中心”“合作共治”等模式，推动“组织范式”重构，形成开放联结的质量矩阵，注重“持续改进”塑造良性循环的质量生态，突出“个性特色”衍生内省独特的质量品牌，赋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发挥，形成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倍增效应。

关键词：教育强国建设；高校质量文化；特色高校；教育生态

教育作为国家强大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其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强国建设中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和共生效应，以及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聚合力和倍增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从世界上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和逻辑来看，都注重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发挥，注重文化与价值观的深耕。因此，高等教育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好龙头作用、基点支撑，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体现文化逻辑，在人才培养各方面体现教育教学规律，在办学治校中体现本土特点，讲求质量、追求卓越，积极构建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其中，高质量的关键在于破除教育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中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质量控制与改进效能的发挥。因此，以质量文化破解质量危机、增强高校办学定力和对自律性的坚守，以深层的信念共同体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且亟需。

目前，众多学者对质量文化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概念属性的研究，主要是在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路径论、结构论、功能论以及多重定义进行初步辨析的基础上，充分探讨其内涵与特征；二是关于建构逻辑的研究，主要是依据 EUA 总结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引入和实施质量文化过程中的战略、领导、参与和反馈等四个方面来细化、具体化质量文化建设的要素和体系；三是关于多重审视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聚焦质量、质量保障与质量文化等内在关系，探讨和反思大学在危机意识、质量担当以及质量能力建设方面是否缺失。以上研究为质量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但就高校紧扣新一轮审核评估“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五自”的内在要求，将质量文化的价值理性化、制度系统化、运行具体化等一体谋划和构建的研究还不够多。基于此，本文结合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深入解析质量文化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厘清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探索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推动质量文化在成型培育、制度保障、执行落实、监督评价、调整改进等全流程中构建有形有感有效的具体机制，积极打造学校可培育、可落地、可提升、可传承的质量文化建设模式。

-----一、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办学形势面临着新型的人口结构变化、多样的社会发展需求与多元的民生利益诉求，这要求既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要办出高质量的教育。国家多次以正式文件关注和强调质量问题，以政策的实施推动质量文化建设。比如，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8年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中多次提及“质量”。此后教育部多次印发文件强调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则是首次将“质量文化”单列为审核要素，进一步突显质量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细化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以评促建，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质量保障制度体系，以质量文化促进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国家、教育部的系列政策导向和具体举措，加强了质量文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力度，其目的在于引导高校对质量的理性回归与价值重构，以文化引领推动质量生成，以文化建设夯实强国之基，以文化创新实现本体超越。因此，以质量文化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是各所高校在建设教育强国实践中的应有之义。

（二）重塑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

当前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布局以及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化、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老龄化叠加少子化等深刻变革下，催生了教育场域以高质量为核心的全面变革与深化改革，加速了从“教-学-管”的教育生态重塑。这一过程是多维因素的综合，需要内部与外部、内部各要素、各层级之间有序良性互动，形成符合时代语境、贴合深刻变革、契合教育规律的重塑与重构。质量文化蕴含深刻的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具有规约和引导作用，其建设好坏对学校办学实际、综合改革、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既是推动教育场域与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的黏合剂，也是高校重塑教育生态、重构教育体系的新引擎。因此，高校要从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以质量文化为引领，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突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追求，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坚持目标导向、系统规划，聚焦高质量体系构建和内涵式发展，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质量提升的系列行动增强质量保障能力和持续改进效能，推动高校构建符合时代语境、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作为基底的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

（三）化解质量危机的关键抓手

巴尼特指出，高等教育并非只是教育概念的一个子集，而是一种自由的、解放的教育观，其本质在于学生个体的心智发展。因此，高等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既是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好坏的关键标准，也是各类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更是“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落实和推进的成效体现。当前，受社会发展转型范式的影响，常规专业知识的学习

已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成长发展与社会实际诉求，高等教育普及化及就业难等现实问题推动高校亟需保持主动适应社会的觉醒，回归教育的本质，秉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来审思人才培养规格与路径。因此，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应从技术层面和理性层面形成人才培养共识，把质量文化作为对学生增值评价和丰富体验的重要手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超越教与学本身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多样发展和多元需求，回应社会的热点关注和理性批判，防范化解引发质量危机的风险隐患，增强人才培养的达成度和竞争力。

二、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逻辑

质量是一个在多领域里运用的词汇。从词义上来看，质量是量度物体平动惯性大小的物理量。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就是满足需要”。文化是一个含义繁多、难以下定义的词，人类学家用文化这一术语表示生活在共同环境中，由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具有“创造性”“涵育性”“延续性”等特征。“质量”和“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复杂且多维，准确把握质量文化的内在属性，既要从历史维度把握发展脉络，又要从现实维度把握时代特征，运用多重定义、多维属性对高校质量文化的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进行深入探析和系统认识。

（二）社会视阈是建设质量文化的出发点

教育是时代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教育，社会需求对教育产生或深或浅、或全面或局部的影响。学校作为社会运行制度结构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人们共同教育需求的社

会建构和行为模式，要在社会分层、互动仪式、发展变化中不断依据新需求作出调整，以高质量的教育回应社会关切与社会问责。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需要清晰坚定的质量文化作为引领，才能在社会各环节的运动与各要素的互动中减少冲突、促进变革，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向前发展。因此，质量文化的社会属性概念主要体现于某一时期的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整体称谓以及人类追求质量的社会实践的总和。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质量文化理应引领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此外，“强教必先强师”，质量文化须蕴含具有一脉相承文化基因的教育家精神，推动对教师作为第一资源、第一保障、第一支撑的共同价值认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凝聚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

（二）哲学属性是建设质量文化的支撑点

永恒主义者赫钦斯认为，人是理性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存在。

存在主义者雅思贝尔斯认为，人是具有“完整精神”的“完人”，“教育的文化功能”要与“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在一起。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认为，专门的教育要与“普遍的精神”或“普遍的文化”结合起来，促进人的理智成就的发展。可以看出，理性是文化的基本特性，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性。质量文化的哲学属性强调理性、重视理智，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具有共同信仰或行动前提的奠基性，从事理性追求、保持自身完善的启蒙性，超越思想与行动、催生新实践的解放性。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

质量文化可以促进大学进一步履行好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发挥好国家和社会公众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主要工具的重要作用,以价值判断提高高深知识的精准性,强化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学术知识的现实化,缓解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好解决高等教育“本体性危机”“合法性危机”。

(三) 教育立场是建设质量文化的关键点

质量文化的教育属性概念是基于教育学的内立场和母学科上,对质量文化深层次价值抉择与本身实际活动的建设样态和集合方式。其目的是回归本质,尽可能避免因社会现实功利需求影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与内功能,核心指向是人才培养质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质量文化要体现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树立以生为本的质量观,强调从知识到理解的高质量教学。其结构性界定包括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反映水平和效果的动态性指标,外显性表征为质量标准、质量监测、质量评估、质量控制,内隐性表征为质量意识、质量价值、质量责任、质量认同,其逻辑就是以质量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的构建。

(四) 实践场域是建设质量文化的立足点

麦克默临说:“教育是一种实践性的艺术”。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不是从哲学流派演绎出来,而是从实践中的矛盾与未定论问题出发,

援引相关哲学观点,以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现价值自由。因此,质量文化的实践属性蕴含着支配群体行为在

追求高质量过程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信仰和信条。它既从长期实践中产生，也终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强调思维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信念与工作、权力等结构的紧密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质量文化需要体现主导价值观，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导向与学术导向、现代化与传统化、依附性与独立性的调和剂，缓解目标的模糊性和相互冲突，聚合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引领政策理性制定与教育深化改革，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上四个维度对质量文化进行了功能性、价值性、结构性、划界式等多重界定，以统整式解读推动质量文化转化渗透进教育实践，以对质量文化的再认识再激活解答当代中国教育之问。基于此，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质量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视阈、哲学属性、教育立场、实践场域之上，围绕“六力”这一教育强国建设的指标征候，重点体现以下内在逻辑。一是由工具技术的异化程序化转向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生文化自觉，以质量文化的理念建构增强思想引领力。二是以学生为中心为根本立场，回归教育本质与规律，推动人的自由与发展，以质量文化的意义塑造增强人才竞争力。三是把质量文化作为内核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共识，促进共享合作与协同创新，开展“有组织科研”与“负责任科研”，以质量文化的动力供给增强科技支撑力。四是在国家现代化和教育普及化中，追求教育公平的最大化与教育质量的最优化，以质量文化的价值所指增强民生保障力。五是履行好大学的社会责任，回应社会需求，缓解冲突、增进合

作，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以质量文化的调和赋能增强社会协同力。六是坚持自立自信自强，推动质量文化由国际化统一化的外生移植转为本土化特色化的内在自觉，促进质量意识和道德自律融合、质量责任与质量实践融合，以质量文化的守正创新增强国际影响力。

三、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然而质量危机意识不强、西方技术标准的舶来、内外部质量认知的博弈等制约了高校质量建设的范式变革，危机意识、超越意识、认同意识的缺乏是追求高质量的瓶颈。因此，回归质量本身、唤醒内在自觉的质量文化建设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质量文化具体实践中，欧洲多数高校主要是在组织结构、文化心理、领导和参与沟通四个层面进行尝试并发现其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由于高校办学历史不长、办学之初基础较弱导致的文化积累不足等现实，当前质量文化建设主要存在着顶层性、内生性、系统性、落地性还有不足，以及参与度、运行度、有效度、彰显度还不够高等问题。

（一）“目标无序”制约质量文化的内生引领

大学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向前发展，在于“它们内在一致性的、使命驱动的价值观已经被其参与者所内化，被其运行的文化确证为重要的”。然而，质量管理引入高等教育内部带来的改变既体现在经济、社会等外在价值上，也体现在学术自治、自由等内部价值上，这引起大学管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比如大学商业化、工具化等价值危机，“五唯”不合理教育评价、追崇量化

评价等学术危机，治理能力、绩效管理等管理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多重目标下由于认识偏差、使命偏离、逻辑偏向而引发的主导目标失重、质量危机和负面叠加效应，其内在本质是缺乏文化引领下的理性选择。以质量文化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具有外在强加性的特点，追求卓越、建设一流的质量文化目标较为模糊，在协调高等教育面临的学与术、个人与社会等内外部基本矛盾时导向作用不明显。

（二）“责任规避”制约质量文化的内聚共生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主体，学界一般有“双主体”说、“三主体”说和“四主体”说等，其选择依据一般取决于当时发展阶段和时空环境。比如“双主体”说更适合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三主体”说适用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当前普及教育阶段则倾向于“四主体”甚至“多元主体”，即由外部层面的政府、社会等，以及内部层面的学校、质量部门、二级学院、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然而现实情境中，主体成分的缺失影响了质量文化建设的完备性，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拥有的质量所有权不清晰，质量责任履行不充分，行动选择的自由裁量及博弈空间过大，推动形成质量文化建设共识的聚力性内生性不够，主动思考和主动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行为还未被固化，指向认同与超越的质量文化表征还未显现。

（三）“制度缺失”制约质量文化的系统耦合

亨利·明茨伯格认为，文化是组织的意识形态，或“与其他组织相区别并将某种生活浸润到组织结构框架内的组织传统与信念”。这种意识形态的浸润就是文化的深层次建构。当前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观的规范性、

制度性并未被具象化，管理实施上的顶层设计、制度体系和具体规划不完备，各层级制度之间合理松散程度的耦合关系不明确。在学校治理结构中质量文化建设的逻辑还不够清晰，以文化底蕴突显中国特色、以质量文化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度不够，并未以质量文化深层次组织建构体现质量文化的理性认同、价值期望、共享取向。在质量文化领域的工作中缺乏具体标准，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等采取的文化建设措施缺乏制度化具体化。高校中校院两级质量文化建设的体系不健全，学校层面关于质量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不够清晰明确，导致学院层面质量文化建设难以在学校统筹下百花齐放，体现自身特点。

（四）“评价异化”制约质量文化的有效持续

由于现代大学文化中的学术自由与质量管理中理论实践的现实冲突，对质量文化理性追求、组织结构、文化氛围等评价难以开展。就质量文化建设本身而言，建设方式、建设成效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模型不够明晰，相关利益者关于质量文化感知差距参差不齐，评价内容与结果的偏离导致难以确保客观性和持续改进性。结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紧扣学校质量管理的实际和教学运行特点，具有正确评价导向的质量文化还未培育成型，以质量文化推动学校质量改进、深化改革上效果还不明显。对“增值评价”“多元评价”“分类评价”等理念的体现还不够充分，通过质量文化引领评价改革推动解决当前教育领域重难点问题的力度效度不大。

（五）“表征趋同”制约质量文化的特色彰显

在各类教育评估的推动下，政府问责向社会问责以及

高校自我问责转变，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治理由科层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中国高校质量保障体系也越来越强调高校自我评价和自身质量文化建设。然而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中，趋同化同质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具有中国特色、自身特点的质量文化突显不足，理念取向上的价值特征体现不充分，缺乏精神内核及其内涵阐释，质量文化的独特功能未能得到彰显。作为大学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质量文化，与高校本身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融合度不够，几种文化协同建设的统筹性还不够好，还未构建良性长效的互动机制，在形成合力推动学校完善治理结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内生动力和内在向心力不足，对外的独特性和对内的一致性未实现良性融合。

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向

从质量文化的角度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进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质量文化的建设，理应回应社会关切，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秉持新的质量观，突显学生中心，注重产出导向，形成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建立质量共同体。

（二） 打造“使命中心”，树立内生聚力的质量价值观

新时代的大学面临着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双重叠加压力下如何更好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能职责的时代命题，只有秉持中国立场和文化自觉，才能厘清责任担当。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蕴含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根植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根基，体现主导价值观，以内核稳、内生性强的质量共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本土特点的质量文化

范式。在教育强国建设这一时代视角下，高校要把质量文化建设作为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大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以及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树立质量文化观，引导全体师生追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理性认同，以质量意识、文化觉醒推动质量标准、质量管理的要素落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和教育教学全环节，增强高校治理过程中核心价值观与组织表征的匹配度、融合度和凝聚力，形成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二）推动“合作共治”，构建协同发展的质量共同体

从组织边界看，质量文化建设的外部主体为政府、社会等，内部主体为学校、各科层组织及教师、学生。各方主体作用的发挥、多元参与的效度取决于共享取向的强度，要明确各质量主体所拥有的质量责任与质量所有权，厘清不同质量主体的责任协调与责任整合，优化外部主体、内部主体以及内外部主体间良性互动，打造协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落实机制和质量共同体结构。此外，指向认同与超越的质量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信任文化、反思文化、效能文化，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结构中要注重组织氛围和组织文化的营造，以开放和健康两个视角来审视学校氛围，通过氛围测量工具界定氛围的开放度，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归纳组织的健康度，进而培育良性互动的质量文化，建立质量文化认知框架，树牢质量意识，达成合作共治的教育质量目标共识。

（三）重构“组织范式”，形成开放联结的质量矩阵

学校是科层要素与专业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具有科层系统和松散耦合系统的特征。其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质量文化亟需构建一种解决专业-科层冲突、融合价值-工具理性、引领共生-超越发展的组织范式、联结矩阵。一是以开放系统观推动顶层设计。将文化系统作为组织内部的子系统，联结其与结构系统、个体系统、政治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围绕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等，对学校质量文化的特点和状况进行梳理，衡量其强度、深度、广度，厘清组织责任与专业责任，明晰质量文化与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形成质量文化战略规划。二是以理性系统观促使制度形式化。将质量文化视为促进理性决策的技术工具，全面梳理学校规章制度，总结现有规章制度对质量这一关键点的突显度，以质量为核心修订完善现有规章制度。聚焦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建设过程，围绕“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内在要求，及时梳理支撑和保障质量文化建设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完善“输入-转化-产出”的质量文化建设范式。

（四）注重“持续改进”，塑造良性循环的质量生态

质量文化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理应是动态的、维新的、积极发展。高校需要结合学术自由与组织管理的特性，强化学术文化与组织文化的融合，避免出现不同主体、不同活动、不同价值观、不同组织文化而产生中断的“空白文化”。在建设过程中，注重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对质量文化建设效果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实施以“P（计划）-D（执行）-C（检查）-A

（反馈）”模型为良性循环的质量文化建设监控体系，明确质量文化指数，清晰反映各利益相关者对质量文化建设的感知度和期盼度。注重对数据的多渠道收集、多方式处理、多层面反馈，建立质量会商机制，协同推进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促使质量文化建设达到“理念形成共识、制度设定科学、运行能够闭环”的效果。推动形成以改进为导向的评估文化，关注院校自我评估过程及结果的反思、对质量标准规范的遵循及自我改进情况，从而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提高教学质量，形成突显学生中心、聚焦教学改革、强调质量控制、确保证据支撑的改进机制，真正实现“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建”。

（五）突显“个性特色”，衍生内省独特的质量品牌

教育部强调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其目的在于引导各高校基于发展定位与办学实际的不同，结合自身优势办出特色和水平。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质量文化建设需要从外生向内生转变，唤醒主体意识，深挖所蕴含的特色底蕴，凝练精神内涵，彰显个性文化，避免趋同化与同质化，打造质量文化品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现代化与传统相继承，注重外驱型质量文化和内生性质量文化的融合，推动形成中国教育传统的精神与智慧。作为质量管理的基层组织，学校内部二级学院应在学校对质量文化建设顶层设计的框架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结合学生发展实际，深入思考有自身特色的质量文化建设方案，细化具体建设任务，促进质量文化与立德树人相融合，与学术文化、校园文化等文化的其他内容相融合，增强以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效能。

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质量文化建设作为高校质量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其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需要在共性特点探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总结提炼个性特点，深耕精神内涵，找准具体抓手，形成长效机制，积淀文化特色，以学校可培育、可落地、可提升、可传承的质量文化建设模式推动其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倍增效应，进而赋能教育强国建设。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26 年第 1 期

超越技术主义

——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多重审视

任胜洪 杜瑞军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一直被视是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和提升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质量的“可算度性”日益突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技术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质量保障与提升教育质量的本质诉求渐行渐远。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在对既有质量保障体系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质量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带有价值倾向的实践模式，注重质量价值观的塑造，强调不同行动者（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尊重、信任、沟通、协调至关重要。通过确立可行的质量目标、完善质量治理、付诸质量行动、注重质量评估等方式，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才能建立起持续改进的组织氛围。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质量文化

长期以来，各国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一直被视是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和提升的“保障”。然而，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逐步认识到，外部质量保障制度建设陷入技术理性的陷阱，与提升教育质量的本质诉求渐行渐远^[1]。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日益理性化和专业化的同时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权力机制^[2]，要使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一项可持续的事业，需要对原有的质量保障机制进行全面反思和改进。在这种背景下，质量文化建设应运而生。2021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办法（2021—2025 年）》（简称《新评估方案》），将“质量文化”列为审核指标，表明“质量文化”主张从理论研究进入了实践领域。讨论质量文化，需要把对质量的讨论与对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反思结合起来，也需要厘清质量文化建设与质量保障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质量文化”主张因何而来，走向何处。

一、对可算度性的批判——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审视

（一）“前质量”时代的精英主义质量观审视

在“质量”这一概念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之前，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拥有一套机制确保他们的工作质量。在这套机制中，人的品质和工作质量直接产生关系^[3]。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大学维持其质量，更多是依靠内部成员的自律和自我约束而建立起来的，对外则通过设置资格和仪式等门槛，避免不合格成员的进入，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在哈维和格林看来，“前质量”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质量观，认为质量是与众不同的、无与伦比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企及的^[4]。精英主义的质量难以通过特定的标准衡量。如果说要有标准，就是声誉，就是那些具有历史的厚重性、独特性、卓越的研究的机构，在历史的积淀中所散发出的独特的、无与伦比、卓尔不群的魅力。精英主义质量观不依赖于外部质量保障机构，而是依赖于每个学者按照自己的准则行事，质量是不证自明的^[5]。

（二）“质量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可算度性的批判

到了近代，高等教育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是提升社会、国家的竞争力等方面其作用和意义都进一步凸显。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价发生了转向，由我的质量我做主，转向我的质量“他——各种外部力量”来做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很多国家在赋予高等教育更大自主权的同时，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办学行为进行负责，特别是对质量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源于工商业领域的质量概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学术界对于把质量概念引入高等教育

领域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质量概念的引入能够让公众根据资源配置、师生来源、道德价值观、成果产出、持续的质量改进举措等等指标区分好的高等教育和失败的高等教育；反对者则认为，对于质量概念的论证是“浪费时间”，因为教育质量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引自工商业领域的质量概念没有考虑到教育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6]。用工业化的质量模式转移到对大学学术和服务质量的管理上存在很大缺陷，把教育作为一种教化人心的活动演化成为新实证主义表演的工具^[7]。

到目前为止，质量已在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中非常流行。但正因为质量概念源于工商领域，带有很强的市场“基因”。因此，物有所值、效用最大化、增值评价与满意度、标准化与过程控制、目的适切性与结果导向等均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核心话语体系和关键指标。教育质量被简化为各类客观的、绝对的标准。哈维指出，事物本身越复杂，其可罗列的资质清单就越多，但不能把教育质量理解为一系列指标，质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被肢解的、分化成多种属性的概念，就如人的发展，不是德性、智力、技巧、情感等的拼接和组装^[8]。受科学范式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数据为本的计算式教育评价成为现代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方式。这种计算式教育评价导致大学滋生表演性文化，带来“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加剧大学的内卷化等一系列问题^[9]。

（三）高等教育质量的“教育性”的遮蔽

教育质量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教育“产品”的质量，而非“教育”的质量。教育如果不再是一种陶冶和熏陶，

不再对未来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怀有期待，无论如何物有所值，对教育而言都是失败的。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西方大学似乎对道德教化保持“戒心”，认为道德教化会带来认识上的偏见。道德缺位带来了哈瑞·刘易斯所批判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学生们追求分数而放弃了责任、信仰和同理心，教师们追求论文产出和引用率，而放弃了道德教化和为人师表。教育在自由、平等、理性、科学等旗帜的指引下，陷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信仰和权威被认为是必须破除的藩篱，学生们的道德信念被尊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道德崇高感所包围，在质疑、解构、开放、反对本质的借口下获得自以为是的解放。虚无主义其显著表现不是缺乏坚定的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它促使人们放弃了求知欲与对自己不足的认知和反思，放弃了善恶的评判，成为精致的自我主义者。

现代大学在学术规范、学术责任、服务社会等方面面临诸多道德挑战，大学已经不再能承担起思想启蒙，匡扶人心的责任^[10]。伦理和道德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政府对其实施的公共政策和改革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益负有道德义务。政府有责任规范高等教育，改进和完善质量标准，把核心价值观和育人主张融入教育活动之中，以提升其创新能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大学有义务确保其研究和教学质量的高标准。无论国家的质量标准和框架如何，高等教育机构都有义务维持其研究和教学的标准，需要对道德和伦理要求有非常明确的标准，高校领

导者有义务确保学术机构的治理秉持伦理道德标准。高校在服务利益相关者时必须坚持伦理标准。任何违反伦理和道德的行为都需要严肃追责，同时确保相关的决定符合道德要求。对教师而言，学问和人生本为一体，对学生而言，进行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亦是教育之本意^{[11] 52}。因此，需要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重新界定，即把伦理和价值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品质。

二、对技术主义的超越——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内涵的澄清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技术主义批判

今天的人类世界早已被看作是一个由技术构造起来的世界。在技术主义的主宰下，高等教育质量被对象化为抽象的“科学事实”，被窄化为一系列可测量、可评价的“质量标准”，高等教育质量的“可算度化”和“教育性”的遮蔽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保障的过程也就成为权力的“支配和控制”的过程，在政府与学校、学校内部的行政与学术、学者群体、师生之间制造不信任，创造出责备与顺从的文化^[12]。福柯在解释规训技术时指出，检查把层级监视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这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13]。现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技术在越来越追求科学性、专业规范性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了它的反面。

更需要指出的是，质量保障与评估的技术性会以科学的名义，造就一种技术道德化的现象，被评估者必须服从

评估，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科学比其他的权威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分离最彻底的化身^[14]。这就陷入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人们本想通过发展科学的评估达成自己的目的，自以为能控制技术使用的方向，但当技术成为评估目的本身时，对它的控制却变得很难了，甚至几乎不可能^[15]。把质量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本意是要诊断学校发展中的问题，回应社会诉求，从而实现质量的持续改进，但与之伴生的公开、透明、审计、问责等在高等教育领域广泛认同的良好治理却让大学走向了管理主义、官僚主义和追求技术主义的道路上。哈维因此提出了质量的终结^[16]。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审视

质量文化概念是与质量概念伴生的，并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的实践反思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广受关注。把质量文化引入高校实践环节肇始于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在2002—2006年发起的质量文化项目^[17]。EUA发起该项目主要有三个目的。

其一，改变把质量视为控制、管理的刻板印象，消除信任隔阂。通过引进“文化”概念，把对质量的认识转变为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和组织所有成员的集体责任。EUA提出质量应基于信任。质量文化就要在校方、教师、学生、合作伙伴、社会机构等之间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并在学校间、学校内部形成一种关于质量价值、质量实践的分享机制。EUA认为，质量文化是内部推动质量持续改进的组

织文化。包括两个层面：机构层面——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各要素是为了内部成员的协作与质量改进，个人和每个部门的任务、职责和标准被清晰地界定。个体层面/职员层面——组织成员共享一套关于质量的价值、信念、期待和承诺，是组织成员内心对组织质量观的理解和情感认同，是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质量文化成为一种转化的过程^[17]。

其二，打破对质量标准化的迷恋，尊重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传统。从质量文化视角来看，质量标准太过刚性，高等教育机构千差万别，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并不存在，对标准的追求易导致对创新的抑制。因此，就需要转变对质量的认识，质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通过检测和评估程序进行认可的过程。质量也不是对投入与产出的计算，而是不同主体基于不同情境，在制度创新、学术传统、社会需求和学生自由选择之间谋求平衡，在学校内部建构起适合自身发展需要，具有个性化的质量观念和实践模式，质量文化也为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灵活性。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机构才会形成富有活力（Vibrancy）、充满生气（Vitality）和丰富多彩（Variety）的“3V”文化，高校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卓越^[17]。

其三，建立一种“好的”质量文化，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应对外部挑战。EUA 发起的质量文化项目就是要推广一种“好”的质量文化，并把其作为一种理想的实践模式。建设质量文化，一方面需要学校管理者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需要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践行。通过质量文化建设，在 EUA 之间分享、推广典型经验和典型举措，从而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透明性、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样，质量文化就被视为一种应对问责失灵，构建一种多中心、多主体，且主体平等、利益相关、权利共享、责任和结果共担的质量治理策略，成为一种积极的，推动质量持续改进的、好的质量实践和行动。

但哈维等明确反对把质量文化视为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手段。他认为质量文化应该完全从外部一整套质量保证程序中解脱出来，在学校内部建立一个实践者自我批评和反思的社区。如果质量是每个院校从自己的历史、使命、目标、定位以及所面临的环境等出发来界定，那么学校在面对外部评估挑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就会不同。哈维据此划分了四种质量文化的理想类型^[18]。①响应性质量文化。它是一种外部驱动的质量文化，对外部的评估、审查持积极态度，主动制定质量改进的议程和前瞻性规划，探索如何从政策或要求的参与中获得最大利益。响应性质量文化会在学校内部产生两种价值和两套行为模式，一套是缺乏自主性，主要应对外部评估的行为模式，一套是在组织内部日积月累，固有的行为模式。师生员工在两套模式中不停转换身份和角色。②应付性质量文化。也是一种外部驱动的质量文化，但对外部评估持有消极态度。对评估所导致的信任的丧失、自主权的受限愤愤不平，心有不甘，但依然屈从于此。应付性质量文化可能会招致师生员工对质量建设的对立情绪。③再生性质量文化。是一种内部驱动的质量文化。关注外部环境和需求，但主要是把外部的政策、资源转化为自我发展，实现价值增值的机会。再生性质量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它不断吸收外部的知识、信息、实践经验，并因地制宜进行

再造，致力于打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不断学习，不断超越。④维持性质量文化。也是内部驱动的质量文化，强调维持现状，固守组织内部的规范、制度，尽力抵制外部因素的干扰。这一模式聚焦基层学术组织，认为每个学术组织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质量文化体现的是专家、学者的意愿而非公开透明的标准，如果要发展一种更加开放、自我审视的尝试将可能导致一种不可调和的抵触。

四种理想类型的质量文化反映的是不同高校结合自身定位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质量文化并不是创建的，而是在学校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自然发展起来的。质量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当学术社区内的每个成员的积极性都被激发，他们才会形成一套有关质量的理念、价值、宗旨的分享机制。哈维特别提醒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的质量文化，要注意警惕文化殖民主义，不要把质量文化视为灵丹妙药，盲目地把在一种情景中适合的文化移植到另外一种情景中^[18]。每所学校在借鉴时，都需要谨慎考虑该种文化的适切性问题。

当前，把质量文化建设视为提高组织绩效的有效手段，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可以被设计并可重塑组织的观点占有主导地位^[19]。哈维对质量文化的界定提醒我们，要避免把质量文化的理解“简单化”和“技术化”，认为只要在质量保障体系中“嵌入”有关质量的信念，质量的价值、质量的标语和仪式等文化要素，并通过对管理对象——师生的尊重、信任就可以带来质量的持续改进。大量的研究也证明，在质量文化建设策略中，管理者明确角色和责任、建立伙伴关系、优化人员和过程管理，强化沟通协调，建

立质量承诺和质量共治机制能够带来质量的改进和提升^[20]。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改进和提升的是什么质量?如果质量文化建设仅仅被视为质量保障的“技术升级”,而没有回到原点,思考教育质量的内涵。质量保障技术越是升级,越是背离教育的初衷,大学就会成为追名逐利的“名利场”。如若教育对质量的追求成为如此,不仅不会带来文明的昌盛,反而会陷入有理性的疯狂,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三、价值塑造——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 质量共同体的价值塑造

对质量文化的认识需要回归“文化”之含义,钱穆认为“非仁无以为群,非群无以久,非久无以化,非化无以成文,是为人类文化之大源”^{[11]4}。文化意味着某种崇高、深邃和令人尊敬的东西——一种我们顶礼膜拜的东西。它和自然一起,成为评判人及其行为的尺度,但有着更高的尊严。与社会、国家、民族或文明这些字眼不同,它似乎从来没有贬义的使用。文化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恢复了人类最初的完整性。在这个层次上,人的能力能够充分发展,在他的自然欲望和社会生活道德规范之间不存在冲突^[21]。因此,质量文化必将和价值关联,价值是质量的底色,也是组织文化的核心。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需要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功能定位和责任使命结合起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高校从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一一定的社会责任。高校的社会责任首先体现在服务本民族、本地区的责任。高校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上每一所高校都带有深刻的民族国家的烙印。一所真正伟大的、高质量高校,就在于它

是心系国家，厚植家国情怀，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承担责任的高校。当然，作为知识生产、贮存、传承和转移的“才智之地”，高校本质上是国际性机构。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正是知识、教师、学生的国际流动推动了知识的创新和优秀人才的聚集，造就了世界一流大学。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更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承担着无与伦比的责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走向世界舞台，必然要求中国高校承担起与大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为推动国际理解，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应对全球挑战，促进人类社会整体进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22]。如果高等教育无法承担这样的职责，就不能说它是高质量的，如果高等教育机构没有这样的价值追求就不能说它是卓越的。

对质量文化的认识也需要追求“教育”之意义。伦理和道德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因此需要把对质量的理解与“德性”关联起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办法（2021—2025年）》从教学工作评估转向了教育教学评估，更加突出了对“立德树人”的关注。立德树人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国教育实践对人

的全面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立德树人注重协调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把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大德与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结合起来。

当然，无论是高校的责任、使命追求，抑或是个人的“德性”追求，都必须转换为主体自觉、自省、自律的认识和行为才能长久和稳定发展。质量不能是外部界定和赋予的，而是质量主体自主制定的，质量主张不能是领导和管理者的事情，而是组织内所有成员组成一个“责任共同体”，质量文化鼓励每个院校从自己的历史、使命、目标、定位以及所面临的环境等出发来界定质量，将管理者、教师、学生等高校内部的多个利益相关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协商和对话方式共同致力于质量提高。尊重大学，尊重大学中的每个人，不是把尊重、信任作为一种手段，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与产出，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这应是质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二）质量信念的共享原则

EUA 认为，任何质量文化都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元素：第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信念、期望和对质量的承诺（心理方面，指理解、灵活性、参与、希望和情感）；第二，具有良好定义的，提高质量和协调努力的有关过程或管理要素（指个人、单位和服务的任务、标准和责任）。EUA 报告认为，质量文化体现为一种组织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群员工一起工作，以实现他们的具体任务。其中，共享质量意识就极为重要。哈特等构建了一个有关质量信念的金字塔：睿智、卓越的领导者的整体设计谋划构成了金字

塔的底座，然后逐步把质量信念、质量价值、质量行为层层传导，直至组织中所有成员都把质量信念和价值作为行为的准则^[23]。哈特注重卓越领导者在质量共享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EUA 除此之外，更关注质量共享的机制和原则。

一是强调信任尊重为前提。在质量管理视角下，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强调自上而下的合规性审查、根据评估工具进行绩效问责，被评估者更多是被动地履行职责。而在质量文化视角下，学校中的每个成员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共同托举起学校的声誉。质量文化注重自下而上的动员，更加关注行动者的质量承诺、努力意愿与质量责任，更加关注个体的意识和态度，更加尊重师生员工的价值诉求，更加注重激发所有人的主动性和投入精神，唯有如此，质量改进才会有牢固的基础^[23]。

二是强调赋权参与为保障。与责任相匹配的是赋权，责任感可以被唤起，但要保持一个权力分享的管理结构，把教员、学生和利益相关者纳入决策体系之中，让他们对自己是主人翁有更强烈的感受，从而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和确保内外部沟通渠道的畅通。质量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建立一种民主化的质量观，给予参与者对影响自身发展的事务的参与权。赋权和增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学生而言，可通过学生评教、自主管理、自我定位等方式进行赋权，从而增强学生自主发展的能力。教师也是如此，通过赋予教师参与学术事务的权力，也可以激发教师的自主性，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4]。

三是强调对话沟通为关键。在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自称是质量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吉布斯

提出建立“足够好”的对话机制，主张教育的质量应通过教育实践者和受益者之间富有教化意义的对话来衡量^[24]。这种对话既不同于以消费者为中心，倾听顾主的心声，也不是利益博弈，协商谈判，争取各自最大的利益，而是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各主体开展的理性、包容、自律的对话。

四是强调反思改进为目标。作为一种推动质量持续改进的治理策略，需要建立一个就质量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一个实践者自我反思的学习型社区。这就涉及什么是“好的质量”“如何甄别好的质量”以及如何实现“好的质量”的反思。反思不止于批判，更在于其建设性。学习型组织建设为凝聚共识，培育起展望机遇、迎接变迁的能力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三）质量文化建设的技术路径

强调质量文化建设的技术路径是想说明，质量文化建设不仅是一种理念，而是有具体的实践路径。但作为技术，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绝不能本末倒置。维索尔伦把EUA质量文化的建设路径分为三个模块：一是正式的结构要素，包含质量目标，策略以及资源保障；二是连接性要素，包含领导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动员能力；三是人的要素，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集体的能动性，如共享价值观、彼此信任，其二是个人的能动性，包含责任、承诺和投入等^[25]。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自上而下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质量动员相结合的系统工作，是连接质量观、质量治理、质量行动、质量评价的实践模式。

其一，质量文化建设要确立可行的质量目标。只有具

有适切性的、形成共识的质量主张才会把组织成员凝聚在一起，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共同的质量主张需要在不同的“坐标系”中锚定。一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坐标中明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发展任务。高校在精英教育阶段、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功能定位、责任和使命要求，有不同的质量主张和质量发展任务，需要通过时间轴丈量自己的发展程度，突出质量意识适切性和前瞻性的融合。二是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的空间坐标中找准自身的位置。高等教育质量主张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具体情景，受其所处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影响具有个性化、情景化特点，但不意味着对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客观性和通约性的否认。如果放弃了对质量标准客观性的认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就会走向封闭，并成为一种自说自话。高校需要通过空间坐标突出质量意识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平衡。三是在学校、市场和国家需求的价值坐标中既要积极回应高等教育应承担的学术责任，同时又要积极捍卫大学的育人本性和道德追求。每个组织都需要在这个三维坐标中找准定位，确立自己最优的质量主张。要检测这样的质量主张是否可行，就需要制定一个质量发展的战略和规划。每个组织都需要对自身的优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全面的分析，要对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条件、发展任务有清晰的判定。这是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制定质量发展战略本身也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进行质量动员、确立质量意识的过程。

其二，质量文化建设要完善质量治理。EUA 针对质量文

化建设，要求高校保持自主性、透明性、灵活性和有效性^[17]。因此，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完善高校质量治理体系建设，应当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确立高校办学自主性问题，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自主性要求学校必须在财政和法律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以确保自身能够自主制定长效的质量发展策略，包括质量发展规划、过程监管、结果反馈等。高校的自主性一方面来自法律的保障、外部社会的信任与尊重，另一方面也来自学校和学术团体的自律和承担学术责任的能力。二是建立开放、透明、有效的质量保障和质量发布制度，这是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和义务。高校应当健全自身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质量管理的规划与实施方案、质量的奖惩体系、质量的评估与认证体系、质量标准与质量指南。加强专业的教育质量检测信息、数据系统，提升质量管理与评价部门的专业化能力，为质量改进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信息支撑，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质量报告。质量文化建设是与践行质量承诺的一套可靠的证据文化和有效管理有关。三是建立共治协作的质量治理机制，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保障。首先，学校各部门要分工协作，共同承担质量发展责任，同时要借助制度规范，合理赋权，保障师生员工、利益相关者在质量标准制定、质量过程管理、质量评价方面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其次，学校内部还需要建立一个教师、学生、管理者、外部利益管理者在内的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对话、沟通机制。要健全和完善学术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等各类委员会，加强工会、社团组织建设，畅通对话交流渠道，围绕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议题进行协商交流。再次，学校要加强学习与支持服务机构、教师教与学发展中心等支持、服务机构专业化建设。在高等教育质量认证过程中，要把教师、学生、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沟通协调机制运行有效度、教学研究支持保障度等作为认证的基本条件。最后，学校可以在科研管理、教学改进、学习支持与服务、沟通和决策机制等多个专题开展试点，积极探索一种“好的”质量治理实践模式，然后在全校推广。

其三，质量文化建设要付诸质量行动。质量文化是以实践为导向的，关注实践者是如何投入质量文化建设的各个过程和环节之中。埃勒斯把质量文化建设分为四个要素：结构性要素（structural elements），使能要素（enabling factors），质量文化要素（quality cultures components），连接性要素（transversal elements）^[26]。质量行动就是把各个要素付诸实践的过程，也是把质量意识和质量治理与实践者的行动结合起来的过程。首先，质量行动就是要把有关质量的知识体系内化到师生员工的行动之中。这就需要推动两种知识体系的学习，一是对学校有关教学、科研、服务等的质量标准和要求方面的知识、有关改进质量达成目标的策略、质量创新以及质量分析和评价等方面的认知；二是对组织和个人的质量协商机制、质量承诺、质量协议等要素的认识。这个过程是实践者平衡多种需求的协商与互动的过程。其次，质量行动致力于通过质量文化要素塑造共享的价值和信念。如塑造榜样人物，强化影响质量的仪式以及展示与质量相关的文化符号。最后，质量行动关注实践者如何应对学校的质量保障举措。

这就需要开展教师教学、科研投入调查、学生学习投入调查，了解师生员工的诉求和愿望。

其四，质量文化建设要完善质量评估。不能仅仅把评估视为进行质量改进、问责的工具，或者把评估视为提升质量和效率，提升机构声誉的工具。需要把评估视为一种“教育学”（Pedagogy），或者视为自我反思、评论和学习的过程。评估具有教育学目的。评估不是个体的“单方行动”，评估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教育形式的实践活动。实施评估需要明确五个基本责任^[27]。①评估者有责任认可评估具有伦理属性。评估者不是一个自由、独立的研究者。对其伦理关注也不仅仅是其背景偏见带来的不同解释。如果把评估作为一个伦理性的、带有价值倾向的实践，评估者就必须明确评估是为谁服务的，代表谁的利益，是受谁委托的，什么样的评估方法是可信的，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接受的，评估过程中揭示的问题会对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个人收集数据的偏好与个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评估过程中认真思考。②评估作为一项具有伦理性和价值倾向性的活动，必须倾向阐明评估的目的。包括解释清楚评估的问题，同时考虑使用评估信息可能产生的后果。③评估作为一项具有伦理性和价值倾向性的活动，必须对利益关联者进行清晰的说明。应该特别留意是否有意或者无意把利益关联者排除在外。实施评估者必须注意评估过程中考虑了谁的需求，谁的诉求被忽视。必须注意使用哪种方法，使用谁提供的数据，由谁进行分析等等问题。要正视评估所引发的主张、焦虑和争议并达成理解，对仍然有争议的主张设计重复评估过程^[28]。④评

估作为一项具有伦理性和价值倾向性的活动，应当把评估方法作为基础，在评估方法、伦理要求和价值承诺之间寻求一致性。⑤评估作为一项具有伦理和价值倾向性的活动，将评估有关的质量、结果、问题的解释权、判断权赋予个体。实施评估的个体应当对评估结果进行解释，而不是认为评估结论是自明的或者让其他人对结果进行解释。

质量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带有价值倾向的实践模式，不同行动者（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沟通、协调至关重要。只有所有行动者在理念和实践过程中达到同频共振，真正的质量文化才可能建立起来。《新评估方案》引入质量文化概念，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一定程度将从外部问责向内部自主保障转变，从管理主义向共治合作转变，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转变，从统一标准向个性化发展转变，从注重合规性审查到注重质量的持续改进转变。但质量文化建设的序幕才刚刚打开。《大学》中所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应成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精神航标。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

中国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指南

(试 行)

一、研制前言

1. 形势与背景

质量文化是持续提升大学教育质量的持久内在动力。从世界范围内看,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世界发达国家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强调外部质量保障走向内部质量保障,从强调资源要素投入转向强调学生发展,由此形成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三大质量保障理念,推动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外部控制转向内部质量文化建设新阶段。

走进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开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立德树人为根本的内涵式发展新征程。2018 年国家唱响了“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主旋律,掀起了“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当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校加强自我质量保障和推进质量文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要求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把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将“选树质量文化示范校”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旨在通过政策引领、典型示范,深入推进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得到全国各类高校的积极响应。但由于国内学术界对质量文化研究不足,且现实中受“外控式评估”的影响,高校对质量文化建设不同程度上

存在认识模糊、体制不全、目标单一、行动乏力等问题，迫切需要在政策引导下，得到专业指导和同行互助，并希望先进高校能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以下简称“CIQA”）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支持下于 2019 年 6 月正式成立，由全国 450 多所各类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构自愿结成，是围绕高校质量保障体系及督导、评价、监测等工作开展同行互助、协同攻关的社会团体，负有指导和帮助全国高校开展质量文化建设责任。为此，CIQA 秘书处本着“以合作促发展”的宗旨，组织专家团队总结国内高校的先进经验，借鉴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外高校联盟的通行做法，研制了本指南。希冀以此推动我国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中国标准”和“中国经验”。

2. 理念与主张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把质量价值观及标准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牢固树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理念，形成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本指南推崇以下理念与主张：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非检查出来的。“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提高质量为目标的组织文化，成熟稳定的质量文化是提升大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大学质量文化根植于自身的独特文化。建立以校为本、特色发展的质量观，是每所高校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

——大学质量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是一种发展理念、精神文化和团队意识。大学质量文化建设不是外部强加要求，而是学校自主追求；

——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质量工程，从经验走向管理、从评估走向保障、从制度走向文化，学校应重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质量文化建设研究，需要“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并最终落到内部、沉到底部，内化为每个人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3. 宗旨与目标

CIQA 秉持“以合作促发展”的宗旨，坚持“携手共建、合作共创、资源共享、互助共赢”的原则，主动服务于高校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督导、评价、监测等工作，大力推动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本指南推行的宗旨与目标包括：

——为全国高校加强质量文化建设以及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教学督导、专项评价和数据监测等工作，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内容要点及工作建议；

——为高等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外部评估机构开展评估认证、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活动，提供可参考的相关标准和指导框架；

——以此为抓手，开展相关的专家指导、同行互助、协同攻关、交流互鉴、示范辐射等活动，促进全国高校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文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以此为杠杆，促进各类高校完善治理结构，深化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引导质量管理从经验、监控走向制度、文化，并推动内外部质量保障的联动与互补；

——以此为契机，完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推动国际、校际之间交流、互信和合作、互认，为全球提供“中国标准”“中国经验”。

4. 范围与原则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高校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和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对质量的定义也存在差异。质量保障表现为高校对自身教育职能和目标的坚守和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生对质量管理制度、规范要求的服从和配合。而质量文化是基于管理者、所有师生的主动要求改进的意愿，需要赢得师生内心的一致认同，是一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与养成活动。因此，本指南的使用范围及原则包括：

——指南只是提出一般性理念与原则，不代表具体的质量保障和质量文化建设，不同管理体制（民办、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不同类型的高校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指南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指导性，考虑到全国高校存在地区、类型及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并不强制要求各类高校面面俱到，而是在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灵活采用；

——指南努力搭建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利益相关者参与、第三方服务的治理体系，积极推进“上下联动、以外促内，自觉行动、自主追求”的治理模式，既体现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同频共振”。

二、建设要点及工作指南

1. 领导体制与规划制度

领导体制与规划制度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高校通过完善领导治理机制、制订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度，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标准，在办学定位、资源配置、教学管理、教师发展、教育评价等规划与制度上，突出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充分体现“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能力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1.1 领导体制

学校领导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学校应确保党对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个标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各项保障资源，确保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为此，向学校建议：

（1）高校应坚持“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以党建引领质量文化建设，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深入实施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工作，推动学校形成“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努力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新时代教育新体系。

（2）高校应确保学校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教学工作的核心地位、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教学建设的先行地位。

高校应努力改善教育评价机制，推动领导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

（3）学校应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等教师发展重要论述为指引，以师德师风建设引领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打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新时代教师队伍。

1.2 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在学校发展和质量文化建设中发挥谋划和引领作用。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加强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有效运行工作，注重将质量文化建设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为此，向学校建议：

（1）**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列入学校战略规划。**学校章程应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专项计划等方面有明确的质量方针和质量要求。要制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专项计划，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不足分析，并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得到充足的条件保障。

(2) 注重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一把手”工程，确保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学校的质量标准、组织体系、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建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方位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3) 注重质量文化宣传并强化全员质量意识。加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研究，明确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定期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或教学工作会议，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相关学习与培训，向广大师生员工传播质量文化，增强其质量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并落实到教学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从而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1.3 政策制度

学校以完善政策制度为基础，建立质量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并保证质量保障的政策连贯、制度完备、信息透明，全体师生充分理解和普遍认同，为质量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

为此，向学校建议：

(1) 建立健全质量保障政策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应定期更新和反映国家政策文件中的质量要求。在学科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有相应的质量政策、配套的人财物支撑以及考核评价制度。

(2) 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学校有明确的质量理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将教学质量

要求纳入教师岗位聘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岗位聘任等各方面。建立教师和学生的荣誉体系，激励教师潜心教学，积极参与教学改革，提高教授上课率，并鼓励学生多样化发展、全面成长成才。

(3) 吸收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鼓励校内外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学校质量政策和保障制度的制订和完善，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校内各类人员能充分理解、认同学校质量保障的各项政策制度，主动参与质量保障和自觉接受质量管理。

(4) 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完善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加强对质量保障规章制度执行过程的监督，定期对各项质量保障政策制度开展评审，了解质量保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倾听师生意见并及时进行调整与改进，并凝练质量保障的品牌与特色。

2. 组织架构与协同治理

质量文化建设需要建立适配的组织架构，正确处理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关系、学校和基层教学组织的关系，从监督控制走向自省自律，促进教职员工的质量自觉。同时，各级组织机构相互联动、有效沟通和协同治理，为质量文化形成提供组织保障，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1 组织架构

学校建立适应质量文化生成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组织体系，包括学校、学院、教学基层组织三个层面以及行政、学术两大类型。按照“管办评”分离的思路，处理好质量保障专业机构与学术组织、行政部门等之间的关系，

强化行政部门对学术组织的支持与服务，压实基层教学组织在质量保障中的责任，确保各自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及工作相互联动。

为此，向学校建议：

（1）建立健全质量保障学术组织。建立校院两级学术（或教务）委员会以及基层教学组织（名称不限），学校章程及相关规章中明确赋予其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职能。明确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岗位职责，确保学术组织在招生入学、专业设置、课程教学、毕业及学位授予等方面发挥质量保障作用。譬如：

——**校院两级学术质量（或教务）委员会：**审议人才培养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大政策与措施；审定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课程体系、课程标准等并指导课程建设；领导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实施等。

——**校院两级其它学术组织（举例）：**招生学术组织负责制定招生入学标准，遴选学生，以及处理学生投诉等；专业学术组织负责制定专业设置标准（包括设置依据、条件及主要课程、培养环节，审议新设专业、变更、或撤消已有专业等）；课程学术组织负责制定课程设置标准（包括课程大纲、教学内容、教材选用、考核形式）等；毕业及学位授予学术组织负责学生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定（包括审核认定课程学分、转换学分，提出毕业（结业）、肄业等意见）。

（2）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专业机构。在强化学校职能部门质量管理责任的同时，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从学校、学院、基层教学组织三个层面健全质量保障组织机构，队

伍数量、结构及人员素质满足工作需要，逐步推进其专业化、专门化，明确其工作职责与运行机制，促进内部质量保障工作的良性运行。

（3）加强支持“教”与“学”的服务机构。质量文化建设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及评价，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加强教与学的咨询服务，促进从监督到支持、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变。为此，要建立健全教师发展机构、学生服务部门、数据支持和院校研究部门（但不局限于此）等，并明确各自在质量保障及质量文化建设中的职责。譬如：

——**教师发展机构：**提供教学培训、指导、咨询等专业化的服务；有培训计划，内容丰富多彩，供教师自主选择；支持教师反思实践和开展教学研究，及时有效地为教师解决疑难问题，并为教师发展提供各种机会。

——**学生服务部门：**提供学业指导、心理健康、职业和就业辅导等方面的帮助；组织学生对课程、讲座和研讨的质量评价，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并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和继续深造等方面服务。

——**数据支持和院校研究部门：**开展学校层面的数据分析和院校研究工作，依据数据分析结果为学校的质量规划和管理提供服务，加强院校研究（校本研究），为质量文化建设和学校改革发展提供专业化、专门化的咨询服务。该部门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将此功能赋予质量保障部门。

2.2 协同治理

学校质量文化的生成需要各部门协同合作，包括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教师与学生、校内外利益相关者之间开

展密切的沟通交流，保证各级组织机构相互联动、有效沟通和协同治理，提高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此，向学校建议：

（1）强化协同治理的领导核心机制。注意质量保障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协调，明晰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和 workflows，正确处理学术组织、管理部门与保障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并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

（2）落实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明确学校全员都参与质量文化建设和质量保障过程，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质量保障机构与学术组织、支持服务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明确质量保障的责任主体、工作主体和评价主体，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并确保相互工作联动。

（3）营造质量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坚持激励导向，突出基层学术组织在质量保障中的基础地位和质量责任。建立约束机制，明确各级管理部门和支持服务组织在质量保障中的支撑作用。涉及学生利益的事务应有学生代表参加，并充分听取学生的申诉和意见。

3. 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

完善质量标准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建立健全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并构建要素俱全的质量保障体系，是国内外高校的通行做法和必由之路。通过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的有效实施，唤起每个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促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螺旋上升。

3.1 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是质量保障的基本依据。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建立健全“三全育人”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有关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的国家标准，以及国家三级专业认证的行业标准，鼓励有关高校参照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标准及国际实质等效标准。

为此，向学校建议：

（1）明确质量方针及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明确学校的质量观及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制定有本校特色又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确保校内师生理解接受和校外利益相关者广泛知晓。

（2）坚持底线标准、鼓励追求卓越。正确处理学校标准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学术组织负责相应质量标准的制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修订。明确质量标准是“底线”要求，鼓励以持续改进、追求卓越为目标的质量保障。

（3）完善“三全育人”的质量标准体系。从人才培养全过程、全方位建立健全覆盖全体成员的质量标准体系，充分体现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理念。体系分解应科学、合理，质量标准应明确、清晰和可操作。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建设、课程教学、考试、实习实践、论文、毕业及学位授予等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

——**专业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各专业有明确、公开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全覆盖、可衡量的毕业要求。培养目标符合学校定位，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明确毕业生可服务的专业领域及服务面向，人才定位和职业特征清晰并体现专业特色；毕业要求不仅要支撑专业培养目标，还能落实到所设置的课程体系之中，应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的人才培养规格要求，满足“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要求。

——**专业课程体系及课程大纲**。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应有企业行业专家的广泛参与，课程设置要能全面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要科学设置各类课程，避免因人设课，努力打造“金课”，挤掉“水课”。各门课程大纲应包括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形成性评价、课程考核等要求，课程目标应可预期、可考核。课程体系要能支撑毕业要求，课程大纲应明确、公开并为教师和学生广泛知晓。

3.2 保障体系

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可靠保证，也是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立足学校实际、体现管理特色、加强内外联动，构建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要素俱全、闭合循环、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体系，是国内外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通行做法。

为此，向学校建议：

(1) 明确构建质量保障体系的理念和思路。在理念上，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在理论上，可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出发，把握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和

关键环节，在标准参照下实行常态监测和反馈控制；在方法上，可综合运用全面质量管理（TQM）、戴明循环（PDCA）和自动控制系统（ACS）等基本原理，亦可借鉴 ISO9000 质量体系等有益做法，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内部管理体制及治理结构，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框架及运行机制。要突出学校的主体责任，巩固教学的中心地位，强化过程管理的质量监督与及时反馈，营造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2）把握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和运行机制。保障体系应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从确定质量目标到职责分工、从资源配置到过程管理、从监测分析到反馈改进等相互衔接并形成闭环运行。努力做到质量目标清晰、任务明确、机构健全、责任落实，管理部门、学术组织和支持服务机构等职责到位，教学督导、专项评估和数据监测等有效实施，完善信息化数据平台，实现常态监测与及时反馈，重视结果利用和持续改进。

（3）完善保障体系“六有”要素并与时俱进。基于国内外高校的经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一般具备“六有”要素：有质量目标及系列质量标准；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及工作联动机制；有专门的保障机构及相应专业人员；有督导、评估、监测等新型评价制度；有质量监测信息化平台及信息发布制度；有反馈预警和持续改进机制。同时，注重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迭代升级，加强督导评价与基层教研活动和教师发展工作的联动，推动从监督控制转向支持服务；逐步推进质量保障的重心从校级、院级下移到基层教学组织，努力实现从经验走向科学、从制度走向文化。

4. 保障手段及运行机制

基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运用多样化的保障手段，加强质量常态监测，并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相互衔接和内外联动，已成为国内外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新常态。

4.1 保障手段

科学运用教学督导、专项评估和数据监测（不局限于此）等各种保障手段，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和持续改进，是高校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通行做法。

为此，向学校建议：

（1）教学督导。包括校院两级督导和领导听课、试卷毕业论文（设计）抽查、教学管理工作检查等。要完善督导组织和听课制度，鼓励院系或基层教学组织多形式开展同行视导活动；推进教学督导从行政性“监督”“控制”向“咨询”“指导”转变，有效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2）专项评估。包括专业评估、课程评估以及其它专项评估等。建立健全自我评估制度，多元化、分层次、全方位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坚持产出导向和“评估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促进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的有效达成。譬如：

——**专业评估：**建立周期性校内专业评估制度，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重点关注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和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并建立相应的评价制度及机制。课程体系应承担对所有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建立课程体系与毕

业要求的关系矩阵。相关专业主动接受国家专业认证、国际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积极参与国内外同行或行业开展的专业评估/认证。

——**课程评估**：主要包括审核课程大纲、审查教学过程和评估学习成果，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课程大纲审核重点围绕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以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支持服务等对课程目标的适合度；教学过程审查主要围绕主讲教师及教学团队、教学计划及执行、教学活动、形成性评价及课程考核等；教学成果评估聚焦在校生的学习成效和收益上，关注学生对课程的期望、需求和满意度。课程评估应判断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为课程改进提供依据。课程评估还应重点关注师生是否明确知晓课程目标及其学习结果，与日常教学督导检查及听课相结合，促进具有高价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金课”建设，持续改进教学工作和修订课程大纲。

——**其它评估**：除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外，应重视开展在校生学习体验和毕业生学习经历调查、教师教学体验调查以及用人单位调查和校友访谈等，全面了解师生的需求和用人单位的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和学生成长。另外，其它相关领域也需要评估，学生课外活动评估、校风学风评估、院系及行政部门工作绩效评估等，对学术支持、学生服务及社团活动等方面的评估也不能忽视。

（3）数据监测。开发与校内质量保障体系相匹配的信息化常态监测平台，建立信息跟踪调查、统计分析及定期发布制度。采取多样化的信息收集渠道与方式，加强校内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信息收集范围取决于学校的需求，要重视信息数据的分析与整合，并能通过反馈机制将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与教师，充分运用到人才培养工作的决策和改进之中。

（4）质量项目（工程）。学校质量文化的生成不仅需要制度化的质量保障，还可以通过各类质量项目（工程）营造出良好的质量氛围，引导师生积极追求卓越。根据需要推行的质量项目（工程），应与课程、专业、学科的建设与改革创新以及教师专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与竞争性资助和公正透明的奖励体系相衔接。

（5）信息公开。学校应及时发布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和质量报告，保证信息的明晰、准确、客观和持续更新，并便于学生、教师、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公众查询获取。公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目标及其预期学习成果、教学内容、学习要求和评价方法）、学习要求、选择机会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情况。所发布的各类人才培养状态和质量信息必须客观、准确，相关质量报告及内外部评估结果应作为校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向社会公开。

4.2 运行机制

质量保障和质量文化建设是推动学校朝着明确质量目标发展的自觉自律活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学校相关部门的工作联动、政策制度的有机衔接和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参与，通过形成相互关联的管理闭环和工作合力，真正将质量文化植入学校全方位工作和融入师生内心。

为此，向学校建议：

（1）把标准树起来，把责任落下去。一方面从学校质量方针出发，围绕“三全育人”制订一系列质量标准，使人才培养各项工作都能做到“有标可依、有尺可量”；另一方面，要强化院系教学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和质量保障专门机构的监督责任，推进“学校、学院、基层组织”三级质量保障职责的落实，明确学校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教师与学生应全员参与内部质量保障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实行执行与监督既分工又联动。从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治理体系着手，建立“执行和监督”适度分离又相互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执行-监督-反馈-改进-跟踪”闭合循环的流程。注重各级组织机构相互联动、有效沟通和协同治理，特别是要促进督导评价监测与教学基层组织、教师发展中心之间的工作联动。

（3）重视相关政策制度的有机衔接。系统科学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质量保障的有效性。坚持质量保障制度与学校其它政策制度“一盘棋”，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落实课程、专业建设的岗位职责，将质量常态监测及质量报告与相关单位的绩效考核联系。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在绩效分配、职务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

（4）加强保障体系内外衔接、自我完善。要注重校内质量保障与外部质量保障有效衔接，主动接受国家实施的学校院校、专业、课程等评估、认证活动，积极对接外部质量评估标准与要求。主动接受国内外行业组织对学校质

量保障的体系认证，持续改进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重视校内质量保障体系的自我完善，建立周期性自我评估制度，与时俱进修订质量标准、工作流程、督导评估监测方法及工具，增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感。

5. 学生中心与教师发展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责任。既要坚持学生中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促进学生成长发展；又要引导教师潜心育人，关心教师发展，支持服务教师专业提升，努力营造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

5.1 学生中心

树立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实施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评价，健全过程监管制度，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同时，切实把走进学生、关爱学生、帮助学生落到实处。

为此，向学校建议：

（1）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课程教学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追求，充分了解学生的多样性需求，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和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加强和完善课程教学反馈机制。建立导师制度，确保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和有效学习。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突破习惯性认知模式，着力培养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能力。

（2）实施以产出为导向的评价。坚持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完善过程评价。鼓励教师采用多元的考核评价方法，加强对学生课堂内外、线上线下学习的评价。加强非

标准化、综合性评价，提升课程学习的挑战性。课程考核评价标准和方法应提前发布，重点考查学生的学习成效，判断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并建立学生考核评价申诉机制。

5.2 教师发展

教师发展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学校有责任为教师提供有助于其高效开展教学工作的支持环境，形成有利于教师发展的支持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探索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提供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促进教师发展和能力提升。

为此，向学校建议：

（1）确保师资胜任教学要求。学校应保证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教师队伍，教师聘任考核要注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平衡。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要求教授有责任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各类考核评价机制有利于鼓励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鼓励教师潜心教学、用心育人，促进科教融合、产教结合。

（2）支持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完善教师发展支持服务组织体系。重点面向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开展岗前和在岗教育思想、理念和教学方法、技术等培训活动，提升教学能力，特别要注重针对考试评价技术和开发教学质量评估工具进行专题培训。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选拔、培训、评价、激励和反馈的全流程培育制度，确保教师的职业生涯能得到专业化、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

（3）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设立教学研究项目和课题指南，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引导教师积极探索人才

培养模式、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提供教学技术方法应用的各种培训，提供各种软件工具使用帮助，鼓励教师利用信息化、大数据和智能化等新技术，勇于探索智慧教室的教学改革，积极推进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等五类“金课”建设。加强教研室、课程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制定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6. 多元参与和持续改进

质量文化建设既要关注到不同群体的独特需求，又要谋求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促使各方认识到增进参与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并对自身质量行为进行反思与监控、修正与改进。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持续改进，将有利提高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也有利于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6.1 多元参与

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是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学校应明确质量活动参与者的作用与主要职责，建立利益相关者间充分互动的工作机制，引导其主动投身到质量保障活动和质量文化建设之中。

为此，向学校建议：

（1）校级领导应发挥起领导作用。负责组织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战略规划，把握学校质量文化建设方向和工作重点，明确内部质量保障机构及各部门的质量职责，确保质量文化建设纳入学校规划和经费预算。培养校内外各方

对质量保障和质量文化建设的认同感，重视教师和学生质量保障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他们的参与性和主动性。

(2) 教师和管理人员是中坚力量。在教师及管理人员招聘、培训和奖励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了解其教学观、学生观、质量观以及对于学校事务参与的积极程度。日常工作中应强化他们的质量意识，激发他们参与制定质量标准和开发系列督导评估监测工具，使他们有责任感、归属感并积极地投身质量文化改革之中。

(3) 学生是不可或缺的质量主体。一方面明确学生是学习主体，其成长成才是质量的集中体现，应激发其学习动力和参与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从制度上保障学生代表参与到各级质量管理机构和评估活动中，注意收集学生对教学和管理反馈信息，了解他们对教学质量的满意度，但学生参与不宜与高利害性结果挂钩。

(4) 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合作伙伴。视政府、企业行业、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等为合作伙伴，吸纳他们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质量活动，及时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和改进人才培养工作，努力回应他们的普遍需求和共同期望。

(5) 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充分互动。根据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特点，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建立相互对话和交流机制，以平等参与的方式推动质量保障活动的民主化，鼓励其主动投身到质量文化建设之中。

6.2 持续改进

质量文化的核心是持续改进。只有基于高校全体师生员工主动要求改进的意愿，才能建立深入人心的质量

文化；只有从根本上建立改进和提高质量的长效机制，才能保持质量文化持久的生命力。

为此，向学校建议：

（1）将质量文化建设融入全过程管理之中。从全局出发制定持续改进制度和组织实施、跟踪监督方案。要强化持续改进的全过程管理，协调各方利益和进行资源调整，坚持问题整改与优势提升相促进。

（2）确保质量文化与学校组织文化相融合。将质量管理理念转化为全体师生员工的日常工作方式，将内部质量保障活动视为一种自我反思和提高的重要途径，坚持激励导向，层层落实主体职责，依靠全校各方面力量，增强质量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3）建立并完善高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要采取切实举措加强全过程质量常态监控，开发与之匹配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并及时获得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全过程的质量信息，注重信息反馈和问题预警，提升问题纠偏的时效性、科学性。

（4）定期实施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管理评审。重视对校内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及运行情况进行检视与自省，建立部门协同联动与考核评价机制，注重以客观数据、事实材料为评价依据，并将评审结果与校内经费投入和绩效考核等相关联。

来源：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CIQA）2021年12月